



华灯初上的广西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中心放射出迷人的光芒，宛若为双方合作指明方向的灯塔。

中国与东盟关系是如何走向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

文 / 李志斐

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间，中国与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经历了初建睦邻互信的十年、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十年”和“钻石十年”，从而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合作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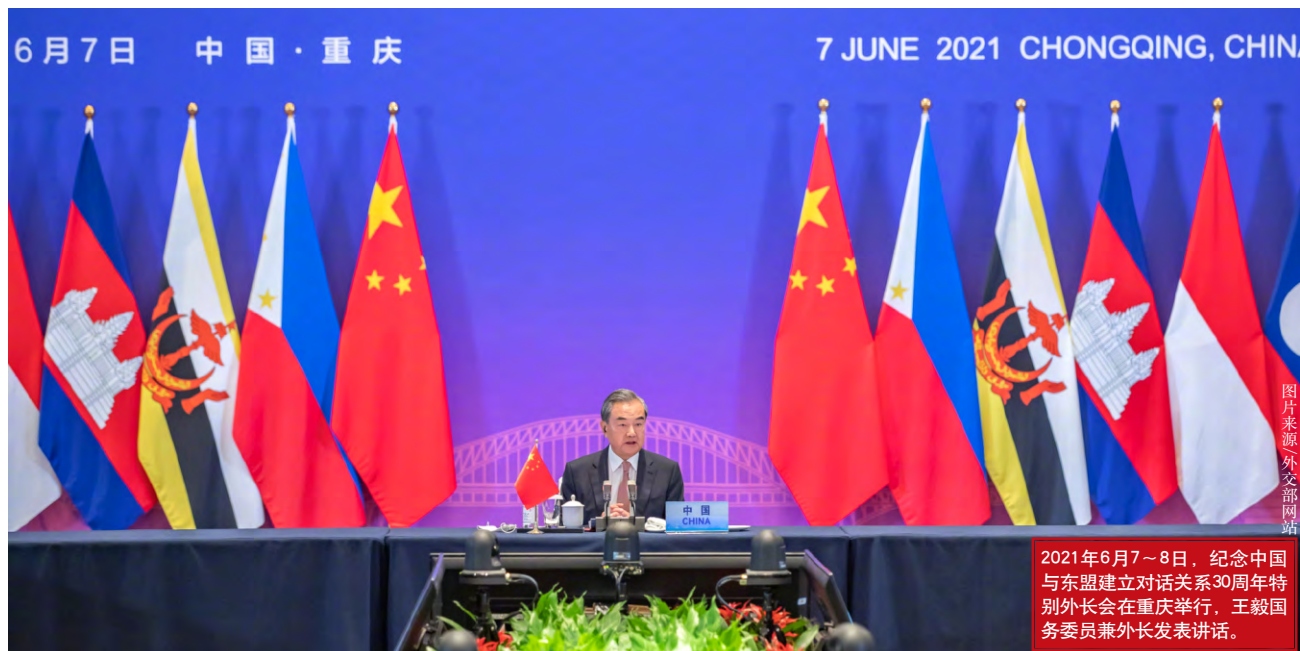
从“冷眼相看”到睦邻互信的十年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受冷战影响，东盟成立后的十余年里与中国鲜有互动，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逐渐复交、建交，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才开始解冻。1991年，中国提议与东盟开展对话，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当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以贵宾身份首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对话关系，其动力来自于双方维护地区和平、加快经济发展的共识。

最初，中国与东盟对话磋商的重点议题是政治与安全，特别是南海问题。经过多年磋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了各方依照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互信的承诺。其间，东盟的“协商一致”理念和中国在坚持主权属我同时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及睦邻友好政策，为谈判磋商提供了重要保障，最终各方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东盟也学会了基于相互尊重的对话之道，东盟更加了解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1996年7月，中国升格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

政治与安全对话有助于中国与东盟相互增信释疑，也为中国—东盟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年7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关于建立经贸合作联委会和科技合作联委会的协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尽最大努力，通过在国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外商谈货币互换安排等方式，真诚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难关，发挥了亚洲经济和金融形势“稳定舵”的作用。同年12月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次召开，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0年，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构想。到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开启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为547.67亿美元，与1991年的79.6亿美元相比，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了另一场颇为意外的考验，那就是发生在2002年的“非典”疫情。这场疫情严重冲击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交往和各国国内秩序，一度令部分东盟国家产生对华不满情绪。中国一方面努力控制国内疫情，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外抗疫合作并开诚布公地与东盟方面进行沟通。2003年4月，中国—东盟关于“非典”的特别峰会在泰国曼谷举行，双方决定在疫情信息通报、疾病控制、治疗和研究以及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双方化“危”为

“机”，信任与合作不降反增。

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十年”

2003至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2003年10月，中国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成为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域外国家，同时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至此，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并逐步发展成为最具实质性和活力的互利共赢关系。

“谋在前，做在实”。2004年和2010年，中国与东盟先后制定了2005~2010和2011~2015两份《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对政治安全、经

济、社会文化三大支柱领域的合作进行统筹安排。进而，中国与东盟在“10+1”框架内建立起涵盖领导人、部长、高官及工作层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外交、安全、贸易、投资、交通、生态环保、卫生、文化、打击犯罪、青年、通信、旅游、能源、教育等十几个领域建立起合作机制网络。2012年，中国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成为公开表示愿同东盟签署该协定的第一国。

在“黄金十年”，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速推进，双方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到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短短十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了四倍，达到4436亿美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

过1200亿美元。

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钻石十年”

“计利当计天下利”。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优先伙伴，中国与东盟关系迈入提质升级的“钻石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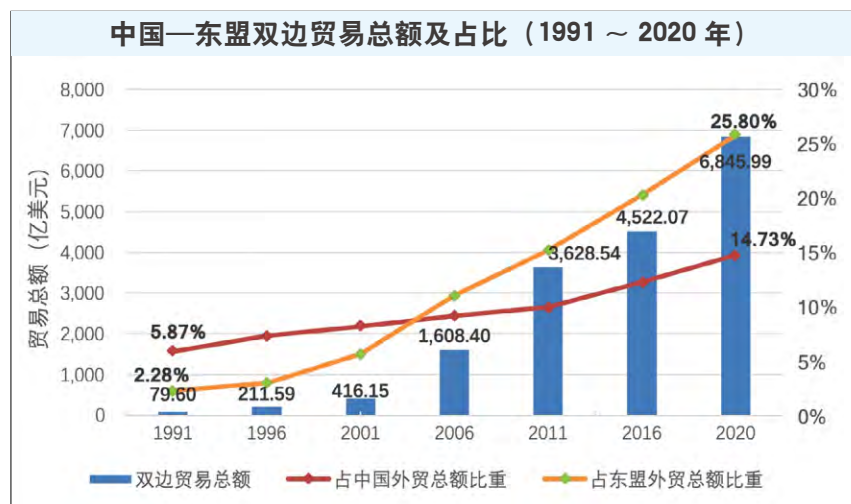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中国与东盟确立了“2+7合作框架”，即在深化战略互信、聚焦经济发展这两点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等七个领域的合作。2017年11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将“2+7”框架升级为“3+X”，构建以政治

安全、经贸、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为主线、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新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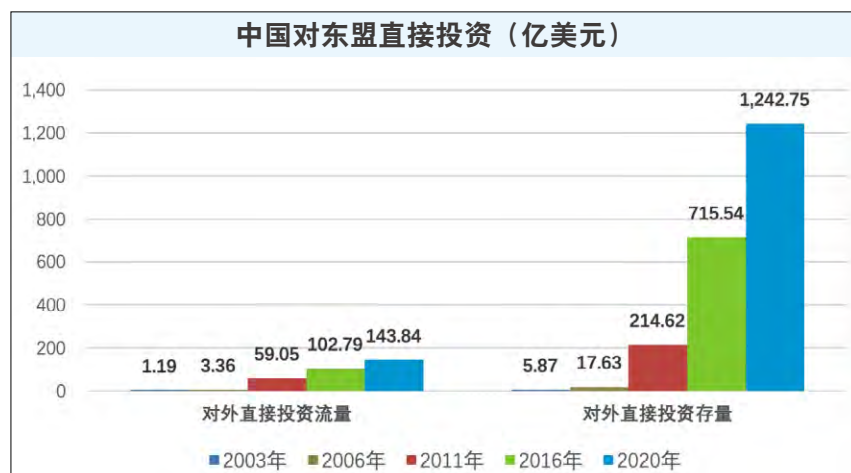
2018年11月举行的第21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制定中长期合作规划的对话伙伴。双方强调以此对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并且努力促进区域各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共同促进“联合国2030年目标”，推动和平、稳定、融合、繁荣和充满关爱的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打造“南南合作”典范。

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于2014年9月开始，到2015年11月正式结束，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2019年10月该议定书全面生效。2020年11月，在中国与东盟等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文本谈判结束，最终得以签署，这标志着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同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随着地区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地区秩序的深度调整，南海问题在域外国家介入下显著升温。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指针



数据来源：199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其余来源于wind数据库



数据来源：202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其余来源于wind数据库

案文达成一致，各国同意继续致力于全面有效完整落实DOC，同时重新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

(COC)磋商并取得实质进展。通过历年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议的召开，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展开了密切的对话与沟通，有效维护了地区和平与海上安全，同时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目前，COC案文后续审读因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而暂缓，未来受区域内外有关国家加大干扰、争端国间分歧加速显现、仲裁裁决负面影响凸显等原因，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中国与东盟国家决定用线上方式推进COC“二读”，并已就前言部分

初步达成一致。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中国与东盟经历了新一轮的“大考”，就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恢复展开密切合作，用实践证明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基础最深厚、合作成效最显著的区域。2021年6月举行的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发表了共同主席声明，认为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取得了里程碑式成果，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在公共卫生、疫苗生产与分配、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社会与人文交流、区域经济发展、海上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推动彼此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促进共同进

步和繁荣。

纵观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发展的30年，双方携手战胜了一系列重大危机，每次共同应对，都使合作共识更为坚定，合作领域得到扩展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的30年，也是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区域对话机制不断完善的30年，这些合作观念与合作机制的形成，是整个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重要经验。^[7]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广西社科院联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中国与东盟合作对世界的五大贡献

文 / 江瑞平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今年迎来而立之年。在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从双边视角审议其成果，也有必要为这一关系的发展进步确立全球视角，看看双方互利合作是怎样产生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因为，30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与世界百年变局同步展开、并行推进的，两者高度关联、密切互动，而且这种互动在下个30年必将更加紧密，贡献更加巨大。为此，笔者梳理了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的五

大“世界贡献”，希望以此为今后双方关系更加丰富、立体的统筹提供思路。

贡献一：引领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前所未有之百年大变局的最重要趋势。1990~2020年的3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增幅，总体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5倍，结果必然是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攀升。按名义汇率测算，这一比重在本世纪头20

年翻了一番，由20%左右提升至40%左右；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这一比重在2008年即已超过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占比更攀升至60%左右。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又总体显现“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特点。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均发挥了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快速崛起，成为公认的首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典型代表；70年代，印（尼）